

跨越地域与历史的界限来重新审视 黄河文明的文化意义

——以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关联性为例证

陈支平

(厦门大学 国学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近三十年来,包括黄河文明史在内的各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地域界限的限制,大家各自醉心于本区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的发掘,而较少关注于区域之外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因素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于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关联性的初步分析,探寻不同区域文化间的超越地域的界限与超越历史的界限,从而从更为广阔的空间来阐释黄河文明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黄河文明;中州文化;闽台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1-0011-06

**Transcend the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Boundaries to Review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with the Example of Relevance between Zhongzhou Culture and Fujian & Taiwan Culture**

CHEN Zhi - ping

(School of Guoxu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have gain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u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gional culture often have been limited by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he scholars have been engrossed in the deep exploring of regional culture, neglecting the issues of other regions, especially the interrelated relations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 Basing on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about the relevance between Zhongzhou Culture and Fujian & Taiwan Culture, the paper tries to seek the boundary which transcends the region and history among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 to explain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Key words: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Zhongzhou Culture; Fujian & Taiwan Culture

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然而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区域(地域)史以及区域文化史研究热的兴起,中国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形成了诸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华南文化等大大小小的众多

区域或地域的模块。等而下之,在大模块之下又有众多的小区域模块。如以闽台区域文化的研究为例,在这一大模块之下,包含着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莆仙文化、闽都文化、武夷文化、金门文化、澎湖文化等等的小地域文化模块。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黄河文明的研究,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区域化研究的倾向,甚

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中州文化”、“中原文化”或“河洛文化”等等的概念相互混同起来。

中国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区域化倾向,对于深化中国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多层面细部考察,无疑将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三十年来,在各地学者的努力下,包括黄河文明史在内的各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就是很具说服力的明证。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地域界限的限制,大家各自醉心于本区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的发掘,而较少关注于区域之外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因素的思考。这样的文化思考,或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我们对于整体文化意义的思考。

二

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州区域,与位于中国东南海疆的闽台区域,相隔数千里之遥。然而这两个互不相邻的区域文化模块,却有着相当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不同的区域文化模块中,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之密切,是其他各个区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近千年来,生活在福建以至后来生活在台湾的居民,大多相信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州河南地区。河南既为先祖之地,慎终追远,闽台区域的历代居民们,就不能不对中州河南怀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心理与情感。

印证这种血缘与文化渊源关系的资料,除了来自闽台民间世代相传的口传资料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闽台区域民间修撰的族谱、家乘之上。从流传至今的闽台两地民间族谱中所记载的各个姓氏的族源追溯上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家族,声称自己的家族来源于中州河南的世家望族^①。

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的文献记载,往往具有从众性和标榜性的特征,需要一个鉴别取舍的过程。而作为当代学者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性表述,则应该是黄典诚教授 1981 年在河南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一次演讲。这篇演讲稿当即发表在 1981 年 4 月 22 日的《河南日报》上。

该文略云“我来自福建厦门。我说的是闽南方言,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还有闽东方言)同是我国九大方言之一。它和普通话有较大的区别。在闽南、闽东和闽北,祖祖辈辈都传说祖宗是河南来的。这件事记在方志上,写在族谱里。据《三山志》说: (晋)永嘉之乱,衣冠入闽者八族’。又据《河南光州府志》载:唐高宗总章年间,福建南部蛮獠啸乱,朝廷以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前往征伐。陈政阵亡,陈元光年方十八,代父领兵。结果削平祸乱,疏请建立漳郡。又据《五代史》,唐末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众起义,南下福建,建立闽国,采取了若干有效措施,开发了福建,发展了经济,推广了文化,安抚了流亡。在中原板荡的时代,福建成了偏安一隅的地方。这是中原人民成批流入福建的简况。福建和河南有着密切的乡土关系。福建方言就是从河南带去的。”近三十年来,随着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以及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寻根问祖的热络,黄典诚教授的这一论点,被不断解读与放大,把历史上河南中州向福建的移民划分为三个高潮期,即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唐初高宗年间的陈元光开漳,以及五代时期的王审知入闽。所谓“从主体上分析台湾同胞的祖根,三百多年前在福建,一千多年前在河南光州固始一带。”^②闽台居民来自河南中州的说法被许多论者所反复印证与宣传。

事实上,黄典诚先生于 1981 年在河南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是相当笼统而缺乏严谨性的。福建民间的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与历史的真实性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三十年来,随着福建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中关于“闽台居民来自河南中州”观点的不断被放大,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也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认真的考证分析。基本的论点是,现在居住于福建与台湾的汉族居民,其先祖族源的源流是十分复杂的,既有自秦汉以来北方汉民

^①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唐金培《欧潭生“三探”与豫闽台渊源关系研究》,见尹全海等编《中原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三十年》,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4 页。

的迁入,也有由原来的土著闽越族后裔转化而来,宋元之后,还有少量海外移民的后裔加入其间。即使是自秦汉以来从中国北方迁移入闽的汉民,也不仅仅是来自中州河南,而是东起辽东渤海、吴中延陵,西至武威、敦煌,均有各个姓氏的后裔子孙迁入闽中各地。真正来源自河南中州的北方汉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现在有人把历史上河南中州向福建的移民划分为三个高潮期,更是张冠李戴,与史实不符。

举唐初陈元光率部入闽的史实为例。目前活跃于福建历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不论是擅长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杨际平、谢重光教授,还是精通明清史的徐晓望、唐文基诸教授,以及闽台文化关系史专家汪毅夫教授,都无法认同陈元光的祖籍地是中州河南固始县。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陈元光原属河东郡人,历经宋元迄于明代前期各种文献所载无异。到了明代中后期,福建的一些地方志书受到私家谱牒的影响,才出现了所谓陈元光出于河南固始的记载,并且由此逐渐影响到明清以来的各种文献记载。因此,后世盛传的闽人皆祖光州固始的叙述,不可全信。汪毅夫教授在最近的文字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古今学者郑樵、方大琮、陈振孙、洪受、陈支平、杨际平、谢重光、徐晓望一千人等对‘闽祖光州固始’之说的批评和质疑是正当合理的。我在《闽台社会史札记》一文里尝谓‘福建在历史上经历过移民开发的阶段,来自中原的移民当有出于光州固始者而‘未必其尽然也’;今之福建居民的主体乃由古代中原移民的后裔与古代当地土著住民的后裔构成。若‘皆曰光州固始’,‘不亦诬乎?’现在,我依然持论不移。”^①我以为汪毅夫教授的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宋代以来关于“闽祖光州固始”的传说之所以盛行于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五代时光州固始王审知兄弟的率部入闽,不仅带来了众多的固始乡亲一道迁移闽中,并且在闽中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权——闽国。固始王审知兄弟的率部入闽,可以说对于福建这个原属于边陲的落后区域的开发进程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作用,给宋代福建区域的人文格局及其民间社会,产生了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②。另一方面,这些从光州固始迁

移而来的王氏家族及其部属,随着闽国的建立,也都成为闽中的统治阶层,为社会所仰慕。于是,在这两种因素的潜移默化之下,闽中的不同来源、不同姓氏的居民,就不能不逐渐受到光州固始这一祖源符号的影响。

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各地的民众迁移到南方各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在北方的祖籍地,并不是仅限在有数的几个区域之内,而是几乎遍布于中国北方的各个郡县。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宋代,中国南方的家族溯源史,开始逐渐地合流到几个有数的中原地域之内。就闽台区域而言,比较集中的祖籍地就是所谓的“中原固始”了。

宋代之前,中国民间撰写族谱的风气尚未全面形成,故各个汉民家族对于先祖的追溯,或许主要停留在世代的口传之中。入宋之后,特别是在理学家的倡导之下,民间修撰族谱的风气开始蔓延,先祖的追溯便成了撰写族谱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先祖的典籍化就不可避免了。根据各自家族的族谱的记载,大家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具有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并且是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人们在塑造自己先祖的时候,首先把眼光注视在帝王之胄的王审知兄弟子侄,以及与王氏集团有着某种政治关联的姓氏上面,并且以此来炫耀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与显赫地位。久而久之,许多家族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祖先,张冠李戴、模糊难辨,最终出现了祖先渊源合流的整体趋势。即许多家族都成了王审知及其部属的后裔。宋代福建民间族谱修撰攀附显贵这一风气的形成和流行,当时福建籍著名的史学家、谱学家郑樵在为自家族谱撰写的序言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

^①汪毅夫《关于“中原与闽台关系研究”的若干思考》,见尹全海等编《中原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三十年》,第74页。

^②参见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1991年版。

固始,其实谬滥云。”^①

其实,对于宋代福建民间族谱攀附王氏固始县的这一习气,一部分文化修养较高的福建修谱者们也是相当清楚的。如泉州《鉴湖张氏族谱》明嘉靖十九年张继明序云“宗之有谱,所以纪世系、明族类、示仁孝也。……盖五季之末而宋之始欤?然世远文字湮废,自一世至十三世名字世数已不可得而详,又云来自光州固始。盖泉(州)叙谱之通说也。”^②安溪《陈氏族谱》亦云:“谱闽族者类皆出自光州固始,盖以五代之季王审知实自固始中来也。……而必谓闽中族氏皆来自固始者,诞甚!”^③在这样的社会习气之下,不用说一般的贫穷族姓,即使是早先入闽的一些名门大族,其后裔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其中。再如与陈姓同称为“闽台半天下”的林姓,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号称是商纣王时期的名臣比干的后代。中原的郡望为“博陵”、“下邳”等,本与河南固始不相干。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不少福建的林姓,其祖籍也变成了河南固始。陈、林二著姓尚且如此,则其他的姓氏之攀附河南固始的世家望族由此可知。

不仅仅汉民家族的族谱修撰如此附会合流,即使是早先属于闽中土著的一些族群的后裔,也在宋代的这一风气中变更其初,把越人变成十足的汉民姓氏。南宋时人王象元曾在《舆地纪胜》中说“闽州越地,……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王姓,谓林、黄等是其裔。”^④现存于福建及东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家族,从明代以来开始仿效汉民家族修撰族谱,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随着北方南迁的汉民在东南地区迅速蔓延并且取得主控权之后,残留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畲族、蛋民,以及唐宋以后从波斯湾地区东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逐渐受到汉民族的影响以及其生活环境的需求,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祖先攀附在中原汉民的世家望族之上。我们现在所阅读到的东南地区畲族、回族的族谱,虽然其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他们自己族源追溯的某些特征,但是从始祖的塑造上,则是毫无例外的变成了与汉族相关联的共同的祖先。如现在居住在泉州市晋江一带的阿拉伯后裔丁氏家族,在其族谱中称“始祖节斋公,讳谨,字慎思,家世洛阳。”同为阿拉

伯后裔的泉州郭氏,其族谱称“吾之先太原人也,始由唐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忠武王。”现为畲族的钟氏,其族谱称“尝考钟氏溯源于微子,……故钟氏为颍川郡。”畲族蓝氏则以陕西的蓝田县为始祖地,故称“种玉堂”。有些福建少数民族的族谱也仿效其他汉族族谱的习气,把自己的祖先附会于光州固始县之上。畲族《雷氏族谱》称“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四姓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分乘五大船由宁波渡洋入闽。”这些少数民族居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光州固始县人的后裔^⑤。

由此可见,至少从宋代以来,福建地区乃至整个南中国,在民间家族的溯源过程中,其历史的真实性与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的。我们在研究福建地区乃至整个南中国的家族发展史的时候,假如过于执着于历史文献的记述和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的真实性,恐怕都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入到比较偏颇的学术困境。

三

文化的认知与历史的真实性其实是无法等同起来的。闽台区域民间对于族源的追溯由此所产生的世代口传资料与族谱文献的文字记述与历史的真实性存在差异,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于文化认知的分析以及这种认知的文化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超越于历史真实性的文化认知,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也许更具有历史与文化的永恒价值。

从我们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即使闽台区域汉民先祖的相当部分不是来源于中州河南区域,但是其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确实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历史过程,势必给居住在闽台区域的汉民后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

①莆田《南湖郑氏家乘》,郑樵《荜阳郑氏家谱序》。

②泉州《鉴湖张氏族谱》卷首。

③安溪《清溪陈氏族谱》,康熙二十一年陈时夏《重修族谱序》。

④王象元《舆地纪胜》卷128《福州景物上》。

⑤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

上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是所谓的“百越纹身地”,十足的边缘区域或者说是边陲区域。北方汉民族的南迁,一方面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代代的汉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中,积累了向往北方汉民族核心的牢固心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北方南迁汉民在东南地区的繁衍生息、兴衰存亡的艰难延续,促使这里的汉民形成了攀附中原世家望族的社会风气^①。于是,向往中原核心的文化边缘心态便在东南地区的民族意识中世代相传、牢不可破。

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反映在福建地区以及后来延伸的台湾地区,同样也是十分显著的。远古闽地,人文之进步,远不及中原地区。福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开发史,无不与北方移民的入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汉武帝时灭闽越国设冶县、三国时孙吴设建安郡以来,经历晋代与南北朝的所谓八姓入闽、唐代前期陈元光进漳、唐末五代王审知建闽国。这些带有福建历史进程里程碑性质的事件,无不由于北方中原强势力量的南迁而形成的,闽中的原有居民似乎始终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境地。从福建文化传承史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乡族社会的建构,道德价值观的承继,还是国家核心主导地位认同等等的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中原核心与福建边陲的矛盾复杂的向往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必然会集中凝聚体现在某一个象征性的文化表象之上,那么,最具典型意义的王审知从中州河南固始入闽的历史故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福建人乃至后来台湾汉民的集体文化记忆。

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与传播的历程看,其实中州文化对于中国周边区域文化的影响力,远不能与周礼兴起的关中和儒家兴盛地的齐鲁这两个区域相比,但是闽台汉民的历史记忆却偏偏集中体现在中州区域,这除了因为河南固始王审知入闽对于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之外,宋代河南文化意识形态的输入,同样也是形成这种文化形态的关键因素。

北方的汉民虽然从汉唐开始入迁闽中,并且也带来了北方士民兴学重教的良好传统,但是终唐之世,福建地区的士子在全国的影响力毕竟有

限。王审知时期,政府从制度上促进了闽中兴学重教的发展,延至宋代,福建的士子已经在国家的科举出仕中异军突起,很快就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理学在北方兴起,中州成了理学兴起的重要发源地。于是,福建的士子们,以到中州拜理学大师学习为时尚与荣耀。特别是这时河南程明道(程颢)和程伊川(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更是闽中士人仰慕的文化思想形态。北宋熙宁年间的福建人杨时、游酢等矢志拜二程为师,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典故。于是,杨时一生“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熹后来创立的“闽学”,与洛学的渊源最深。

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著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源于中州的“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的表述中,已经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特别是中州标识的追随者。我们在福建杨龟山的家乡,看到了他立愿逝世后葬身于墓门朝北远望北方师门的坟茔;我们在游酢的乡里,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关于他和杨时“程门立雪”的传说记述。老实说,对于这样的传说和记述,我一直心存疑问:程氏作为宋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有如此不合情理而有悖于孔圣人诲人不倦的教训、苛待南方学子?这种带有明显矫情意味的传说,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难于言喻的文化心态,即以把自己变成一名北方中州式的“士子”为荣耀。

正是宋代福建的主流知识分子们坚持不懈地从中州那里传承了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进入福建,并且又进一步努力把这种源于中州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融入福建及中国南方的社会之中。这样一来,源于中州核心区域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

^①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

态,就与处于边陲区域的福建各地的社会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文化核心与边陲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每一步发展,无不冠上追溯中州河南的辉煌帽子。这种历史文化的惯性,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历史学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文化则更多的是体现在人们的心理认同的层面,显然这二者是无法等同起来的。从这一立足点我们再来看看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关联性,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从宋代以迄近现代闽台民间家族溯源史的演变历程看,后代的福建以及台湾的民间社会,更关注的是民间口传资料及私家族谱等文本的显示表象,而对于其先祖的真实历史,倒是比较的无关紧要。我们今天探讨闽台家族与中原固始的渊源关系,探讨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传承关系,假如非要一意孤行地寻找什么纯正的“中原血统”及其源流细脉的“真实历史”,我想是既无必要而又永远不可得到,其结果必然是恰得其反而又纠缠不清。我们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一道认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包容性,

才能从无限广阔的空间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造就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与延续,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一直得以传承和发展的辉煌历史。

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她的文化意义应该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因此,我们在当今的时代探索黄河文明的文化意义,无疑应当超越地域的界限,超越历史的界限,才有可能从更为广阔的领域来认知黄河文明的深远意义。文化的超越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通过对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关联性的初步分析,或许可以对从更为广阔的空间来阐释黄河文明的伟大意义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陈支平(1952 -),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陈 瑞